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清流”研究

王维江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清流”研究

王维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流”研究/王维江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7

(马克思主义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第 21 辑)

ISBN 978 - 7 - 5458 - 0093 - 7

I. 清… II. 王… III. 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 IV.
D092.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4821 号

责任编辑 沈佳茹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王晓阳

“清流”研究

王维江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22. 25

字 数 260,000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093 - 7/D · 4

定 价 34. 00 元

序 言

熊月之

任何朝代,都有一线干事与一旁清议的两类人同时存在,前者注重实绩,后者好谈道德。两类人互不买账,互相攻讦,形成政争或党争。同光时代,这两类人被称为洋务派与清流派,其间的纷争、消长、起伏,对晚清政局发生重要、持久的影响。清流派以张佩纶、张之洞、邓承修等为代表。对此,一般近代历史教科书都会提到,学术界也有一些研究,但还缺乏比较系统、深入、成规模的成果。王维江博士以此为题,历时多年,先用德文写成博士论文,再适应中文读者需要,补充了大量资料,续写出这部专题式的著作。

拜读全书,我感到此书有以下一些鲜明的特点:

首先,厘清了清流的概念和所指的对象。清流是边界不很清晰的概念,不但晚清人所说与民国人所说有异,即使晚清人所说,也是言人人殊。本书追根溯源,循名责实,清楚地辨析了不同人物、不同时期、不同情景下所谓清流的内涵,对与清流有关的“清谈”、“清流党”等概念的产生、演变也有细致的梳理,从而使得比较模糊的研究对象变得清晰起来。书中对于民国时期清流何以会成为言情小说与遗老言说的对象的社会原因,作了深入分析,鞭辟入里。

其次,研究了清流产生的时代背景,包括清流出现的政治背景、慈禧执政的特点、个人的喜好对政治运作的影响,清流为何会与金石学结缘、与优伶交往,清流与《申报》声气相应的原因。尤其是后面三点,为以往研究的薄弱之处,凸显了作者宏阔的视野与独到的眼识。

再次,研究了清流人物的差异性,分析了清流表现的多样性。同是清流,表现各异,张佩纶与张之洞不同,张之洞与邓承修也不相同。同一人物,不同时期,表现也有所不同,张之洞前后表现就很不一样。书中对吴可读、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邓承修等的表现、心态,都有细致分析。

总的说来,作者将清流置于对晚清社会综合考察中研究,将清流人物的个人素质、官场人脉、社会阅历联系起来研究,既有对整个时代社会变动的宏观把握,又有对个人特点的人微分析,知人、论事、析理。全书资料翔实,取精用宏,考订细密,文字灵动。一些神来之笔,读来引人入胜。比如,书中论及洋务首领李鸿章与清流后台李鸿藻的差异:“二位李大人虽然名字看上去像同胞兄弟,但实际上毫无血脉与地域之缘,两人不仅籍贯一南一北,而且政见亦常相左。”寥寥数笔,将二李不同之处交代得清清楚楚。

王维江博士自复旦大学毕业后,来历史所工作,后赴德国汉堡大学留学,学成归来,重回历史所,是历史学界为数不多的来自欧洲的海归。他天资聪颖,后天勤奋,潜心史学,根基厚实。对于清流,所下工夫很深,对张佩纶、邓承修、王先谦都有专文发表。在研究方法上,既有传统朴学的周到缜密,又有解释学的阐幽发微。这实在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著作,可以预期,此书的问世,对于晚清清流研究是竖起一座里程碑,对于同光时期政治史的研究,也会有重要推动。我作为他的同事、朋友,曾到过他在汉堡的学校、住所,深悉他在研究中所下的苦功,拜读过他此前的宏文,故乐为此序,以作鼓吹。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8年12月18日

目 录

序言.....	1
引言.....	1
第一章 谁是“清流”?	18
第二章 从“清流”到“清流党”	45
第三章 “清流”的生计与出路	73
第四章 慈禧与“清流”	99
第五章 声色“清流”	118
第六章 琉璃厂里的“清流”	148
第七章 “清流”与《申报》	161
第八章 喜剧“清流”张之洞	194
第九章 悲情“清流”张佩纶	221
第十章 另类“清流”邓承修	251
第十一章 “清流”阴影在海外：郭嵩焘与刘锡鸿的恩怨	278
第十二章 书院：“清流”最后的退路?	301
征引文献.....	328
后记.....	345

引言

大臣谏议，是中国王朝历史的悠久传统。这一制度设计看上去很美：明君贤臣，两相配合，政治似乎很容易进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境界。但实际上呢？要直谏，最起码也要犯颜；而被惹恼了的最高统治者，一翻脸就要整人，甚至杀人，所以谏议总是伴随着悲剧的发生。春秋时期的史鳢“生不能正君”，只好“死以尸谏”。尸谏不须言，而不言的谏议，不正表征出传统“言路”欲言而无路的困境吗？

除了官场中人的谏议，还有在野士子的“清议”，东汉的太学生运动即为一例。“处士横议”的结果更惨，腥风血雨，党锢禁忌。唐代李世民和魏徵式的纳谏与直谏，看上去更像是事先排定的双簧戏。总是天子一言九鼎，庙堂马上鸦雀无声。皇帝和谏臣的政治操行，更多是被体制所铸就的。

清代也不例外：就在《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陕西蒲城人、老臣名相王鼎（1768—1842）豁出七十四岁的老命谏议，并没有换来朝政的些微改观；然而清代似乎又确是一个例外：光绪五年（1879），甘肃兰皋人、卑微的吏部主事吴可读（1812—1879）以六十七岁的老命再次犯颜，却开创出一个“广开言路”的时代。在外“夷”入侵的关头，位极人臣、德高望重的王鼎白送了一条命，忠言无人

要听；而在歌舞升平的“中兴”年代，人微言轻、名声不好的吴可读却以尸谏赢得了御赐“孤忠可悯”的名号。这样的意外局面，绝非吴可读所始料，不然他为何要在诀儿信中一连六个“速”字催其亡命呢？历史就是这么诡谲，令人难以琢磨。

诡谲的历史难以琢磨，难以琢磨的历史才能引发人们长久谈论的兴味，而长久谈论的历史叙述必定呈现出泥沙俱下、真伪混杂的特征。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女主慈禧倡导下的“广开言路”便很诡谲：第一是时间长，光绪初年，朝廷出现久违的劾论热潮，它一直延续到中法战后为止，长达十余年；第二是谏议的主角特殊，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议政的主力不是负有言责的御史，而是玉堂上备顾问的年轻文学侍从，即所谓的翰詹词臣。难怪当时就有“不闻言官言，但见讲官讲”^{〔1〕}的惊诧；第三是谏议的后果奇妙，以前谏臣十之八九既不得善始，更难保善终，而光绪时期的翰詹词臣竟然联翩蹕升，令人瞠目。尽管不得善终，但也事出有因，更未喋血皇城；第四，将这些玉堂儿郎推上前台和前线的是慈禧，将他们突然打翻在地不再起用的也是慈禧。正是这位慈禧太后，在同治年间铁腕驭下，朝堂噤若寒蝉，而在光绪初年则一反过去的作风，竟然成了求贤如渴、闻过则喜的英明女主。在她的翻手覆手之间，一个本来在吴可读眼里“到处先生好好同”^{〔2〕}的庸俗萎靡时代，变魔术般迅速成为一个“到处先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意气风发的时代。

或许正是此次的建言活动有如此多的诡谲之处，当时的人就给它贴上一个新标签——“清流”。新标签具有新内涵，必然带出新问题：“清流”是自称还是他称，是褒义还是贬义？“清流”的称谓又是如何转化成“清流党”的？而“清流党”这一新称谓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呢？如果“清流”和“清流党”表证着朝廷里的政治派别，这些派别真的如同官书野史中所渲染的那样——有后台老板、有核心成员、有组织、有纪

律的吗？如果并不存在这样的政治派别，那么，空穴之风又是如何吹起来的？难道非商业化的官场也曾盛行过自我炒作？

正因为人们对“清流”建言活动谈论得太多，“清流”故事就渐渐地衍化为传奇。传奇已不是真实的历史，然而真实历史转化为传奇的过程，却是值得探寻的历史课题。只不过，这一探寻历程无法绕过如下的问题：传奇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晚清还是民国？他们是什么人、抱着什么目的制造和传播着这些传奇？传奇的版本到底有多少种？哪个版本影响最大？为什么这些传奇能够风行并迷惑住如此众多的读者？

正因为传奇太多，版本太杂，也就带来褒贬不一的评价：有人说“清流”只是政治舞台上的提线木偶，他们的背后深藏着后台老板；有人说他们是慈禧太后弄权的工具和棋子，提拔和毁灭他们的，正是运筹于垂帘之后的女主；有人说“清流”有正义感和紧迫感，敢言敢为，为“中兴”大业立下汗马功劳；也有人说他们攀援附会，人品不值一提，应对中法战争的失败负责……

刚刚过去一百二十余年的“清流”历史，为何就像雾里花、水中月，让人怎么也看不清看不透呢？既然同时代人、稍后的民国人看不清透，那么，专业的历史从业者们能否拨开迷雾、探得真相呢？

一、“清流”研究史

1958年，台湾大学历史系学生郝延平先生的论文《同光新政中的所谓的“清议”》揭开了“清流”研究的序幕。1962年，他在哈佛大学发表了 *A Study of the Ch'ing-Liu Tang: The "disinterested" Scholar-Official Group, 1875—1884*^{〔3〕} 一文，进一步开拓了这一课题的研究。郝先生以“清流党”为个案，用来考察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失败以及中国

人的文化调整问题。他认为,“清流党”不是一个具体的组织,没有共同的纲领,但它却是一个小团体,他们的基础是个人友谊,个人关系是自由的、平等的、相互交织的和平行的。他们有一种小团体的认同感,而这一认同感的源头是成员之间的地域关联。郝先生确定,“清流党”由九人组成,他们是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邓承修、陈宝琛、吴大澂、李鸿藻和刘恩溥,这其中的五人都来自直隶。郝先生的结论是,他们的进士出身、他们在都察院、翰林院和礼部的职责,增强了其思想中的保守主义倾向,但他们又是抱有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他们试图走一条中间的道路,一方面他们要与自强运动的赞成者们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是反对一切西方事物的极端保守主义者。

郝先生的论文无疑是拓荒之作,嘉惠后学,其结论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但支撑其结论的资料明显不足,这就影响了其论证过程的严密性,由此给后学者留下了尚待探索的问题:一、既然没有具体的组织和纲领,那“小团体”又从何说起?如果以地域建立起个人友谊、以个人友谊而形成的社交圈子可以贴上“小团体”的标签,这样的“小团体”当不止所谓的“清流党”一个,如果有“党”,那朝廷应该充斥着这一类的“党”,为何偏偏历史只凸出了“清流党”?二、仅仅根据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和左舜生著《中国近代史资料辑要》确定出一个九人的“党员”名单,是否过于草率?为什么没有梳理辨别同时代人大量的、相互斫伐的矛盾陈述?退一步说,即使有这样的“党”,这一九人名单中的吴大澂和刘恩溥的“党员”身份其实很勉强;但如果顾及到更多的资料,这一“党员”名单会大大加长,“党员”的地域会更宽泛,“党员”的见识也更繁杂,由此会对郝先生的地域造成“小团体”的假说构成威胁,由此必然会对其“小团体”所贴上的“保守主义”标签构成诘难。

就在郝文发表后的第五年(1867),美国学者易劳逸先生(Lloyd E. Eastman)出版了其中法战争的研究专著——*Throne and Mandarins*,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e Controversy, 1880—1885。^[4]该文对中国历史上的“清议”现象做了一个长时段的考察：“清议”是一种意识形态角色(an Ideological Role)，它无法与西方语境中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画等号。把“清议”看作小团体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清议”并没有形成共同的政见或共同的政治步骤，他们的目的和言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充满分歧的。

由此，易劳逸先生把晚清的“清流”也看作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一种“清议”，或者说，“清流”是一种“清议”现象。其特征是反现代化的、反对自强运动及其领导人的，这一特征在中法战争前后演变为强烈的主战言论。该文显然不赞成郝文地域构成“清流”小团体的论断，但令人不解的是，该文又倾向于“清流”有一个七人的核心，这七人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邓承修和吴大澂，在他们的周围，还有面目不甚清晰的一些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同时又强调，“清流党人”(Ch'ing-Liu partisans)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小团体，甚至可以说是尚未定型的小团体。

易劳逸先生的研究无疑更有广度和深度，它给后学者的启示是，“清流”现象错综复杂，简单化的合并和归纳反而离历史实相更远。但令人遗憾的是，易劳逸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又忍不住要给“清流”现象一个结论，结果这一结论反而滑向了他此前竭力保持距离的郝文的论断。尽管如此，易文的研究价值不容忽视。首先，其研究方法至今还值得我们借鉴，这就是把“清流”放在一个长时段里考察，比较此一类历史现象的异同点；第二，他注重考察“清流”现象出现的大背景，梳理出中西冲突下的政治环境和士大夫文化心理变化与“清流”的关系；第三，他关照到朝廷政治权力斗争与“清流”的关联，尤其是女主慈禧与“清流”现象的特殊关系。^[5]

研究“清流”的风骚并非为英语世界的学者所独占。几乎与海外

同步,国内的祁龙威先生在1963年发表了《从奕訢出入军机看前后“清流”的悲剧》一文。祁先生的研究思路与郝文无异,只是将“清流”的范围广为扩大:“清流”有前后之分,前“清流”即“北派”,李鸿藻为魁首,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和黄体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后“清流”为“南派”,翁同龢为领袖,其骨干有盛昱、王仁堪,后来又不断加入志锐、文廷式、黄绍箕、丁立钧和张謇诸人。这种分法,明显是接受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笔记作家的见解。祁先生自己的重要看法是,“清流”现象是“不当权”的“清流”与当权的“后党”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中法战争时期达到顶点。换句话说,“清流”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在朝堂中,慈禧奕訢叔嫂斗法,小叔子引“清流”以为声援;在疆吏中,淮系内部纷争,张树声、吴长庆拉拢“清流”以对付李鸿章。谈到“清流”的影响,祁文以为,恭王“备战求和”的政策来源于作为“主战派”的“清流”;而“清流”最终被任命为会办奔赴前线,“书生杀贼”,乃慈禧借刀杀人之术。^[6]

在60年代的大陆,祁龙威先生这一成果足以与海外的“清流”研究分庭抗礼,在国内也形成一锤定音的权威效力。不知道陈寅恪先生是否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不知道陈先生如何看待中西历史学界对“清流”研究的论文专著,目前材料清楚显示的一点是,陈先生早在康有为百岁冥诞之际的1958年即“感吾家与戊戌政变事”,发出了“百年世事不须论”的感叹。以《光明日报》的影响力,陈先生应该不会疏漏。那就是说,祁文有可能促使陈先生终于在1965年的夏天打破沉默,绍述“百年世事”,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有令人无限神往的三个小标题——“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孝钦后最恶清流”和“吾家与丰润之关系”。遗憾的是,该稿只存下了“零星残稿”,所列三个小标题的后两个已佚,唯一幸存者亦只是个开头。不幸中之万幸,陈先生的寥寥数语,还是清

晰勾勒出了与众不同的“清流”图景：

自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奕訢李鸿藻陈宝琛张佩纶等，外官以沈宝楨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等为浊流。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暄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但其间错综复杂先后互易，亦难分划整齐，此仅言其大概，读者不必过于拘泥也。^{〔7〕}

以知情人兼历史学家的身份，陈先生所描绘的“清流”，出人意料，令人深思。陈先生与此前的看法截然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清流”不是小团体，不是政治派别；第二，“清流”之外，还有“浊流”，而清浊之分，似乎更以个人品格为标准，并未涉及其政治理念；第三，无论清流、浊流，都有京官和外官之分。借用法国年鉴派的术语，陈先生是把“清流”当作一个长时段的政治现象来考察，这对后学者是有益的提醒：“清流”所指人物是流动不居的，越是后来的人，越是给“清流”添加比附上新的人物和新的内涵；换句话说，愈往后，“清流”愈有脱离历史而连接现实的趋势。境由心造，现实的心境不停地构造着“清流”的历史，由此使得“清流”话题愈发云山雾罩，扑朔迷离。一至于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用梁启超的一句话来形容我初读陈先生文章的感受，那就是“若受电然”。它让人从“清流”迷雾中解脱出来。“清流”很难以小团体盖棺，不必费尽心思去钩稽“清流”的成员表；既然不是小团体，当然也就不存在一致或相似的政治态度和观念，因此也不必去总结“清流”一致或相似的各种思想。“清流”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只有考察这一现象出世的背景、过程和后果，才有可能揭示该现象的历史实相，

才有可能对该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才有可能发掘出这一现象背后的意义。这里,晚学以景仰高山的心情,感谢陈先生的片言只语,促使我反思研究“清流”的起点、视角和路径。

“文革”飘起,“清流”的研究归于沉寂。重新发出声音,已是二十六年之后:1992年,陈勇勤先生发表《清流党成员问题考议》的读书札记,标志着这一研究课题的重启。“清流”研究确实又回到起点,陈文将“清流”看作是“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并沿着与郝文和祁文相同的思路,着力考察这一政治派别的成员。他将清流党成员扩大到约二十人,将清流党的作用,看作是“思想保守”的李鸿章与“洋务派重要人物”沈桂芬权力之争的工具。^[8]

随后出现了多篇研究“清流”的论文。1995年,沈渭滨先生发表了《论陈宝琛与“前清流”》一文。沈先生认为“清流”具有“准集团化倾向”,同意清流党成员有二十余人的表述。该文通过对“清流”中坚和健将陈宝琛的个案研究,总结出“清流”人物的政治品格和见解,即他们有着“不媚时俗、不畏权贵、敢于直谏等清流党人共具的风骨,又有注重学习西方、改革内政的鲜明个性。”^[9]1996年,李侃先生发表《清流派与中法战争》一文,从传统的南北之争角度,罗列“清流”成员,考察南北“清流”和“前后清流”的思想特征,故很难说超越了郝文和祁文;李先生在文末又称“清流”“不是有组织的政治实体,也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只是由于对内对外的某些政治主张相同或接近,从而形成的一种松懈的政治群体。”^[10]这一结论显露出与易劳逸专著类似的矛盾和摇摆不定。1998年,周育民先生的《从陈宝琛论清流党》一文,既肯定陈宝琛的人品,也赞赏其政治见解。^[11]进入新世纪以后,关于“清流”的论文也呈现出繁荣的趋势,但无论是在见解上和资料上没有突破,恕不再引。

台湾学者在80年代仍有“清流”研究成果发布。苏启昌先生《张

佩纶与晚清清流集团》的硕士论文,注意到清流党“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与共同政见”,但又认定其“党同伐异”的特质突出,^[12]似乎也与易劳逸先生同调。90年代,林文仁先生完成其硕士论文,在该文基础上形成的专著《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也在2005年引入大陆出版。^[13]正如其书名所揭示的,其研究路径是,从南北派系角力看待政治中的人事与政见之岐,乃“清流”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资料翔实,梳理清晰。然而,把“清流”放在南北之争的框架内,是否会陷于“清流”成为党政工具论——李鸿藻的工具和慈禧的工具——的窠臼,是否同时也陷入“清流”是“小团体”或“集团”的窠臼,从而妨碍了对“清流”以往研究模式的突破和忽视了对“清流”现象背后的意义探寻?

或许前引陈寅恪先生的论述只是断章残篇,或许其梳理“清流”“浊流”大有出人意料之处,如将奕訢归入“清流”,把张之洞划到两个时期的京官和外官“清流”之中,把瞿鸿禨归入到“清流”的行列,^[14]但陈先生对“清流”现象所做的基本判断——“错综复杂先后互易,亦难分划整齐,此仅言其大概,读者不必过于拘泥也。”——直到现在仍然不失其慎重、通达、敏锐和深刻。或许正如“清流”称谓本身所表征出的,这一现象所涉及的人物是“先后互易”的,其流变是“错综复杂”的。晚清和民国私人笔记中所渲染的“南北清流”、“前后清流”以及“清流党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容易迷人耳目。如果不在史料上去伪存真,不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我们的研究,终究还是过于“拘泥”——既拘泥于凌乱庞杂的史料,也拘泥于前哲已有的研究成果。

2003年,刘文楠的论文《析同光清流的思想倾向》摆脱了“党争”的窠臼,从政治与学术的相关度出发,将“清流”放在中西交往与对抗张力下,考察其建言的动机、思想来源,剔析出“清流”的特质——将传统儒学“术用化”来补充其解决现实问题的不足,以此作为对付内忧外患

的策略。^[15]

2006年,杨国强先生发表了《晚清的清流与名士》的长文,系统考察了光绪朝三十多年庙堂之内的清流与庙堂之外的清议之间的交互影响。他认为,两千多年的清议是“政治结构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晚清的“清流”一词“指称当时的言路中人,本是一种没有精确尺度的分类”。“不同的叙述把不同的人物归入清流之内,加上当时依附于清流的各个人物,遂使清流之名的象征意义更多于识别意义。这些人才情有不同,志节有不同,识度有不同,性气有不同,并且年辈不同,遭遇不同”。换句话说,杨先生不赞成学术界流传已久的“清流”有“党”、“有“成员”的概念。他还解释了清流出现的缘由:与太平军内战造成的权力下移,“造就了疆吏的积重与积大”,所以“清流”就具备了“尊王”的意味。“尊王”只是朝廷政治的一面,对待另一面的洋务,清流的表现则是“攘夷”,这是一种自觉意识,很容易演变为“持义理应对新知”。^[16]

我自1992年入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硕士,在朱维铮先生指导下,于1995年完成《晚清的反“维新”思潮》^[17]学位论文,“清流”被作为反“维新”思潮之一种而加以考察的。从此与“清流”结缘至今,期间我对“清流”的看法多有变化,“清流”像是个多变的精灵,难以窥其真面目,令我不敢轻易下笔。直到1999年,自以为真理在握,写了篇短文,虽力图摆脱既有的成见,结果用的还是“清流党”的称谓,可见思维定向之易和摆脱既有樊笼之难。在汉堡大学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先生指导下,我于200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王先谦与“清流”:晚清的学术与政治》(Wang Xianqian und die „Reine Strömung“: Politik und Gelehrsamkeit in der späten Qing-Zeit),^[18]终对“清流”形成比较固定的见解,即“清流”和“清流党”是不同时期的两个称谓,“清流”不是政治小团体,“清流”更是一种政治现象,参与者的背景、人品、政治见解、影响力以及仕途命运各有不同,很难将其归纳到某一个派别,也很难

给它贴上个标签。这些见解也反映在本书的第一、二、六章中。但本书不是原博士论文的翻译,因为回到国内工作以来,我又找到些考察“清流”的新角度和新的叙述方式,所以,宁愿另起炉灶,另辟蹊径,在头脑里形成本书的基本框架之后,再花了四年的时间,写成了现在的样子。

半个世纪的“清流”研究史表明,在基本史料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方法和视角决定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跳出进步和保守的两元对立,摆脱非此即彼的老套路,历史人物才能变得鲜活起来,历史过程才能变得可以亲近和理解,历史叙述才可能接近历史的本相。

梳理前哲时贤的研究成果,于我心中所唤起的,除了敬畏,便是认知之难的感叹。在艰难的认知阶梯上,他们留下的印记似永不磨灭的路标,为后学者指示着继续前行的路径。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自己的这本小书,如果也能成为后来者探索未知的一级阶梯或一个路标,则愿足矣!

二、几个概念的说明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受到了太多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其中的几个关键词,有的从异域移植而来,有的产生于本土,它们在历史记录和研究著作中频繁交替出现,但这些词的内涵和外延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造成叙述的事实和逻辑的双重混乱。在正文之前,有必要做出梳理和定义。

(1) 改革

“改革”是外来词。在西语里,该词是从“Reformation”衍化而来的。其本义与基督教密切相关,比如我们所熟知的 16 世纪上半叶的